



论李忆著《春秋流转》中的女性关系

A Study of Female Relationship in Lee Yoke Kim's

Spring and Autumn Circulation

刘心瑜

LAU SIM YEE

20ALB02267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ANUARY 2024

论李忆著《春秋流转》中的女性关系

A Study of Female Relationship in Lee Yoke Kim's

Spring and Autumn Circulation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目的.....	2
第二节 研究综述.....	3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6
第二章 女性矛盾根源的探寻.....	8
第一节 “非理想化”的母亲形象.....	9
第二节 边缘化的父亲形象.....	11
第三节 小结.....	14
第三章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16
第一节 宿命下的反抗意识.....	17
第二节 女性关系的探寻.....	19
第三节 小结.....	22
第四章 母女关系的羁绊.....	24
第一节 共生母女.....	25

第二节 母亲再现.....	27
第三节 小结.....	31
结语.....	32
参考文献.....	36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书或口述资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yee

姓名：刘心瑜 LAU SIM YEE

学号：20ALB02267

日期：2024年4月19日

论文题目：论李忆著《春秋流转》中的女性关系

学生姓名：刘心瑜 LAU SIM YEE

指导老师：黄丽丽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马华作者李忆著的长篇小说《春秋流转》中的女性关系。李氏擅长探索各阶层人物的内心世界，以男女情感为主线，致力于追求男女之间的和谐。她不仅探索两性的命运，也对两性的心灵和精神状态进行了全面生动的表达，并从女性视角出发，对男女两性的关系进行思考。

本文通过李忆著的《春秋流转》进行文本细读，深入探讨了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及她们所面临的问题。同时，探究男女在两性婚姻中的关系，反思女性对婚姻生活的态度，并探讨了作品中展现的女性之间的矛盾根源、和谐的过程，以及母女关系中的羁绊。本文的主体部分涵盖了五章：首章为绪论；第二章为女性矛盾根源的探寻；第三章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第四章为母女关系的羁绊；最后则是结论。

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李忆著作品中的女性主义、女性形象和创作风格进行研究，主要聚焦于特定方面的阐述，较少涉及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男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作用。《春秋流转》不仅描述了母女关系，同时探索了女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和谐，以及发掘女性的成长过程。但这些方面甚少在现有文献中提及，因此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本文采用女性书写视角对李忆著的小说进行解读，并结合女性主义理论进行探讨，论李氏其中的女性主体意识内容，探讨女性主体下的反抗意识，以及女性如何从中寻找

自己的出路。再来，本文也会通过镜像阶段理论分析《春秋流转》中的母亲形象，深入发掘母亲与女儿之间爱恨情仇的根由。

【关键词】 马华文学、李忆菘、女性关系、《春秋流转》

致谢

这段文字若收笔，意味着即将谢幕四载的大学岁月。然而故事不应戛然而止于此，只有续写才能窥见未来的无线延伸。在过去的岁月中，我曾看过许多人眼泪盈眶的论文致谢，也曾思考过我会为何而感激，当我回首过往的点点滴滴，即使内心有万般不舍，但我仍怀着深深地感激之情。

站在人生转折的岔路口，我满怀期待地迎接未来，非常幸运在我的美好岁月里，遇到许多善良可爱的人，他们给予我许多美好的回忆。在成为更好的人之前，我始终依赖着老师、同学和朋友们的帮助，感激之情难以言表，生命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悄然影响着我的成长。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不辞辛劳，与我共度此段光景的人们。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谨以万分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向本篇论文的导师——黄丽丽老师致以深深的谢意。在选题、资料收集和写作阶段，老师都倾注了极大的关怀和鼓励，给予我许多珍贵的建议。同时，衷心感谢老师对我所遇到的各种疑问都给予了耐心和细致的解答，大大减少了我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弯路，让我深感谢意。

其次，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家人们。多年来，他们对我的栽培与支持是无私的，尽管我并非出类拔萃，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的支持我、信任我。他们的爱我会牢记在心。再者，我要对我的朋友们表示感谢，我们曾一同奋斗、一同进步，怀念我们彼此通宵赶报告的日子，尽管过程很艰辛，但结果是好的。虽然最后我们都会天各一方，但希望你们能够前程似锦。另外，我要感谢拉曼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的所有老师。在过去的四年里，他们慷慨分享知识，提供给我甚多的锻炼机会，让我受益良多。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自己，求学多年，经历大大小小的报告和考试，你已走了漫长的学习路程。感谢你坚持不懈。人生由大大小小的选择组成，希望你一定要珍视往后余生中的每一次选择。要保持对世事的洞察，但不妨碍你对世界的热情，努力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吧！

第一章 绪论

李忆著，出生于 1952 年，为马来西亚著名女作家，曾经任职《马华文艺》主编，现今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拥有数十年写作资历的李忆著，乃一位多产的作家，她起初以写散文为主，其次是小说，而后致力于写专栏，后来“偏爱”小说创作。她认为小说的创作空间比任何文体都大，具有深度、广度和自由度。李忆著常以婚姻、恋爱和事业等角度为题材，目前已在国内外出版了 15 部散文及小说，字数逾达二百万多。她曾荣获多项奖项，包括 1993 年的第一届“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奖”、第十二届“马华文学奖”、新加坡第一届“方修文学奖”散文首奖、首届中国桐乡“全球丰子恺散文奖”金奖，以及第二届中国四川散文奖。

她善于挖掘各阶层人物的内心世界，以男女情感为主线，塑造多样化的爱情故事。她站在女性的角度，重新审视男女两性及其婚姻关系，并对女性的生活与情感进行深入地描绘，展现不同性格特征的女性形象，试图为女性寻找一条出路。她在得奖感言说到“从文学中我探询到人生的复杂和人心的隐秘。是文字给了我这把认识自己、理解人生的钥匙，并且被它深深地感动着。”¹对此，她与其他马华作家不同的是，其作品在涉足感伤和浪漫的同时，又能深入发掘人性的深层，勾勒出人性的丰富内涵。

¹ 李忆著著，《菱花照影》（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15），页 4。

“文章无疑是灵魂的声音，故真情实感比什么都重要。”²因此，她笔下的情感旅程涉及恋爱、婚姻、情变、离异等多种形式。对于独身女性，她表现同情居多；对独立自主的女性，她则由衷赞赏。她鼓励迷失自我的女性进行自我反省，同时激励那些堕落的女性不断忏悔。她的首部长篇小说《春秋流转》不仅描绘了本土风情，也大力描绘女性，深入探讨女性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展现出具有浓厚的女性关怀意识。

第一节 研究目的

本文之所以选择李忆著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她的作品多半涉及男女两性的关系，且不论是对男性亦或女性，她都是一视同仁，不主张两性之间的对立与敌视。她不偏袒女性立场，而是追求性别之间的和谐，她认为婚姻并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也涉及社会、家庭、孩童等方方面面，同时需要考虑社会约束与个人性格的自我约束，最为关键的仍然是两性之间的宽容与和谐。³当然，男性的背叛也是不可容忍的恶行，但其作品却更多的是对女性自身的批判。其次，本文之所以选取《春秋流转》这部作品，因此为李忆著的首部长篇小说，其尝试以本土书写展开叙述，但内容以两个家庭的情感纠葛为主线，通过不同叙述者的视角，展现了小镇上的各种风波和人情世故。虽然她的其他作品也涉及女性关系，但《春秋流转》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以不同年龄层的女性为代表，探索了母女关系和友情之间可能存在的和谐，从中挖掘了女性的

² 戴小华、叶啸主编，〈李忆著〉，《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06），页 206。

³ 马峰，〈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页 42。

成长过程。而和谐的前提是经历了许多矛盾之后才得以建立的，因此我认为《春秋流转》对女性关系有很好的诠释。

女性书写在马华文坛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一面，女作家作为突破男性文化霸权的代表，不仅要抗衡传统父权的压制和结构性别秩序，更多的是对女性意识的反思、唤醒和重构。李忆著认为，女性主义应该让女性与男性的地位协调一致，而非压低男性。不论是爱情、亲情或友情，所有人的关系都应该是平等的，才会实现和谐。⁴因此，李忆著以不同的叙述视角体现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不论是以主角或配角叙述，都积极重构女性的主体意识，同时她也以宽容的心态去塑造男性的形象，并以寻求谅解的态度去对待男性的过失，这很大可能与作者自身的性格和思想有关。然而大多数学者着重于研究李忆著的两性和谐书写，对文中的女性关系研究却很少。基于此，本文拟选取李忆著之长篇小说《春秋流转》为研究对象，试图解读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并对其所蕴含的女性意识进行剖析，进而挖掘文本中女性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以及探讨母女关系间的羁绊，旨在从本论文中分析出不同于前人的观点。

第二节 研究综述

研究李忆著作品的专书和论文并不多，其中涉及“女性关系”研究的有林春美的〈女性触觉——马华小说母女关系与姐妹情谊〉⁵，其通过马华女作家在小说中塑造的

⁴ 方肯，〈对文学真诚，宛如宗教：李忆著〉，《马华文学》，2013年第13期，页23。

⁵ 林春美，〈女性触觉——马华小说母女关系与姐妹情谊〉，《马华文学第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页213-230。

“母亲”形象，探讨她们对自己的性别身份的看法与对待方式。林春美不仅对马华女作家小说中的母亲形象进行分析，也加入了许多女性主义的理论和个人的观点。她认为母亲在马华散文中常被描绘为受苦受难、慈爱而伟大的形象，这既反映了父权社会对“真正女性”的崇拜，也暴露了作品在形成过程中的规范化倾向。因此，她认为马华女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诠释了“真实”。文中主要提供了女性主义者对“母亲”这一角色的看法，以及不同马华女作家对母亲形象的描述，但对于女性关系的课题甚少。

除此之外，有关李忆著《春秋流转》的论文研究，有马峰的〈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著论〉⁶，其认为李忆著的作品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传承了南洋文化的气息，马来西亚多元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其多样化的书写风格，从感伤、沧桑到厚重的思想情感，更是值得学者进一步的思考。其次，马峰评其作品具有对人性的关怀多温婉流露，对文化的关怀多自然呈现，汇聚成一种仁爱与宽容的情感。

李子云的〈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著〉⁷，则评李忆著的文笔简捷，内容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其认为李忆著在《春秋流转》中以另一种表达方式展示了她对马来西亚女性命运的思考。她通过对李忆著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揭示了父权社会对女性个性、命运的影响，其中能够发现李忆著在书写女性形象时，主张一种积极的自省精神，突显了对这些角色的深入思考和个体独立性的重视。

⁶ 马峰，〈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著〉，页 41-48。

⁷ 李子云，〈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著〉，《评论和研究》，1996 年第 1 期，页 50-52。

邵德怀〈别一种风采——试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李忆著的小说〉⁸指出李忆著撰写的每个故事都带有一个亮点，即是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强调展现某些具体事件，包括会影响人一生的偶然事件，而这个亮点的形成是必然的、是具有生活基础的。其次，他肯定李忆著是个具有文学创作才能的女作家，认为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展现出新时代女性的特质、坚毅、直率、勇于决断。他强调李忆著善于通过人物塑造，揭示偶然事件对命运的关键影响，并将她的作品风格描述为“感伤”和“浪漫”并存。马峰、李子云和邵德怀对李忆著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强调了李忆著对女性意识的研究，但唯独缺乏了对女性关系的关注和研究。

纵观以上的专书和论文，大多数学者主要聚焦于从李忆著的作品中探讨女性主义、女性形象和创作风格。然而，这些研究往往集中在特定方面的阐释，较少涉及作品中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男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作用。因此，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旨在通过以上的研究资料，能够更深入探析李忆著《春秋流转》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及她们所面临的问题，同时探究男女在两性婚姻中之关系，反思女性对婚姻生活之态度，并对女性间的矛盾根源、达成和谐的过程，以及母女关系中的羁绊进行更深层的发掘，希望通过分析和阐释李忆著的小说，揭示该小说所传达的主题，并突显其独特之处。

⁸ 邵德怀，〈别一种风采——试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李忆著的小说〉，《小说评论》，1992年第4期，页86-89。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以李忆著长篇小说《春秋流转》为主，至于研究方法，本论文会以文本细读法、女性主义理论以及拉康理论来分析小说中女性之间的关系、矛盾的根由以及和谐的探寻，并从中挖掘母女关系的羁绊。

所谓“细读法”乃 20 世纪英美新批评学派提出的一种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重要方法。这一方法不局限于从作品的上下文及言外之意去欣赏作品，也将作者的文体作为解读作品含义的途径之一。本文将采用文本细读法，对作品进行回溯性的解读，通过对李忆著塑造出来的男女形象及使用的语言进行分析，从而探讨女性之间的关系，进而深入剖析角色之间发展的因果关系。

“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源自 19 世纪的法文 *Féminisme*，指的是女性权利运动。“女性主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女性渴望在历史的线性时间中争取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追求与男性同等的机会和权力，旨在消除女性被歧视的观念。⁹李忆著笔下的女性角色多数秉持着自我拯救的信念，表现出自尊、自立的特质，甚至为了尊严会果断采取不计后果的行动。虽然她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并且反复强调两性和谐，但在作品中，男性的塑造仍然对文中众多的女性角色的生存处境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将综合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等不同类型的理论为基础，以提供更加深入、全面和多元的分析视角，通过对《春秋流转》中女性意识的内涵的挖掘，探究《春秋流转》中女性主体所具有的反抗意识，并将本文的看法与解读结合起来。

⁹ 王先霭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 200。

“镜像阶段理论”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大师雅克·拉康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这一理论主张个体在早期生命阶段经历到自我（ego）形成的过程。拉康把婴儿生命的前六个月称为“前镜像阶段”期，六至十八个月则是“镜像阶段”期。婴儿会透过镜中形象进行想象认同，这一形象不是简单的映像，而是形成自我的过程。拉康认为，“我”的最初形成，即自我是由镜子中的理想形象的认同所产生的。¹⁰虽然李忆著在《春秋流转》中创造的女性角色已经脱离镜像阶段，却描述了女儿透过镜子看到母亲的映像，她们拒绝成为母亲的再现，是因为镜像阶段的她们对母亲亲近，而她们形成的自我可能会与母亲的形象叠合。由此，本文会通过此理论分析《春秋流转》中的母亲形象，深入探讨母亲与女儿之间爱恨情仇的根由。

¹⁰ 张一兵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页 130。

第二章 女性矛盾根源的探寻

《春秋流转》所呈现的女性关系，尤其是母女关系，是复杂而对立的，如水火般难以融合。这种复杂性既源自于母亲本身，也与传统理念和当代社会息息相关。在父权社会中，女性通常依附于丈夫以获得成员资格和归属地位，这种依附导致她们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也可能会受到对于性别角色的固有刻板印象所限制，导致母女之间产生认知和期待上的冲突。就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母女关系中存在着一种情感竞争和焦虑，源于女儿在童年时期对于父亲和母亲的情感需求和争夺。¹¹她们渴望获得父亲的关注，但又害怕失去母亲的支持和爱。这种情感冲突在日后可能会演变成复杂的母女关系矛盾。

在路思·依瑞格蕾（Luce Irigaray）的女权理论中，女性与女性之间的互相压迫，部分是由于男性象征体系中断了女性与其根源之间的联结所致。¹²母亲和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权力分配和情感表达方式对母女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加之父亲在女儿成长过程中对她的态度、参与程度和情感投入等，都有可能塑造女儿对家庭和母亲的看法。这种现象可能在母女关系中得到体现，引发了相互间的矛盾。本章节将从母亲与父亲的形象进行分析，试图从中探寻女性与女性之间的矛盾根由。

¹¹ [奥]弗洛伊德著、周丽译，《精神分析引论》（武汉：武汉出版社，2014），页 600-601。

¹² Luce Irigaray, ed., *Philosophy in the Feminine* (London: Routledge; 1991),101-122.

第一节 “非理想化”的母亲形象

此节以《春秋流转》中的红莲与其母亲唐丽球、令冰与其母亲桂娘为研究对象。母亲和女儿之间所产生的爱恨情仇是萦绕多数人的心结。拉康的镜像理论提到，婴儿与镜中的自己与母亲影像的关系。在婴儿时期，母亲作为孕育婴孩生命的摇篮，从孕期起，其就与婴儿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和情绪连结。¹³然而，女儿在经历俄狄浦斯情结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意识到母亲（类似于自己）已失去权力或地位而对她感到厌恶。《春秋流转》中“非理想化”的母亲在卸下天使面具或母亲应有的特质后，遭到女儿的憎恨。如林春美所说的，因在镜子中看见母亲的映像，或说是阴影，女儿表现出一种“母亲恐惧症”（Matrophobia）。¹⁴这种恐惧症指的是对母亲或母性的恐惧或强烈厌恶。这种情绪可能源自于对母亲的负面形象、童年经历中的创伤或不愉快的母女关系，导致个体对母性产生负面情绪或恐惧。她们抗拒自我与母亲形象叠合，试图与母亲拉开距离。由此，不论是红莲亦或是令冰，她们对母亲这一角色的定义始终是离不开传统女性该有的温柔、关怀和服从等。她们认为母亲过于强势，总是看见母亲对父亲存在太多愤怒的情绪，父亲这一角色在家庭中越来越边缘化，导致家庭逐渐走向毁灭性的破坏，从而断定母亲是家庭幸福的破坏者。

“我不认为我可以宽恕她，父亲爱她至此，在她气数已尽，真相大白之后，仍表现得那么情深一片，也不知道是她几世修来得福气。”¹⁵红莲对母亲的憎恨主要源于母

¹³ 张一兵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页 120-121。

¹⁴ 林春美，〈女性触觉——马华小说母女关系与姐妹情谊〉，页 220。

¹⁵ 李忆碧著，《春秋流转》（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6），页 62。

亲在家庭圆满、丈夫对其深情一片的情况下，却选择了出轨。唐丽球的行为和思想，尤其是出轨的举止，深刻地影响了红莲。虽然她已是人妻，但依然打扮容光焕发站在门口等待她的情夫经过，好让他跟她说上几句话。即使红莲尝试谅解这个被视为“淫妇”的母亲，但当她无意间看到母亲与其他男性的亲密场景时，她还是对母亲心生反感。而唐丽球在红莲面前所展现的行为和态度，或许会影响到红莲对自己的认知与自尊，进而决定了红莲对自己与外界的看法。当红莲清理母亲的遗物时，她将母亲昔日的白纱裙比在身上，对着镜子端详了许久，又试穿了摆放一起的高跟鞋，她在房里走了一圈，发现镜子里出现一个似曾相识的模糊身影，像是那张泛黄相册中的朦胧人影儿，她仿佛看见母亲的影子在自己的身上。她极度抗拒母亲的悲剧延续到自己的身上，她试图将母亲的遗物都付之一炬，以切割与母亲之间的联系，希望摆脱母亲所经历的悲剧，也意味着杜绝自己日后的灾难。这段描写可以看出，红莲在面对母亲的形象时，内心的挣扎和抵触。尽管红莲讨厌母亲随时绽放的艳情，但在某种程度上她也走上了和母亲相似的道路。

令冰对母亲是另一种怨恨。女儿是父母之间的共同牵挂，她对母亲掺杂着爱与恨，同时对父亲也潜蕴着同情与关爱。令冰对母亲的怨恨和偏袒父亲，揭示了她对家庭动态的矛盾认知。令冰对其母亲的爱恨，不仅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也受到母亲对她的态度所左右。令冰自懂事起，就习惯了家里因经常争吵而僵硬的气氛，以至于形成了她对母亲的刻板印象一直都是母亲太唠叨，语气不好，总是无端端地挑起许多事情来吵，导致家里常年不和，而父亲总是默默忍受着，所以她对于父亲持有更多的同情和关爱。正因此，令冰总是偏袒父亲，将家庭的不和谐归咎于母亲，她认为母亲总是责怪父亲，才会造就父亲忧郁寡言的性格。这种偏袒出自于对母亲行为的反应，但也反

映了她对父亲的理解和同情。本文认为孙桂娘之所以对自己丈夫充满怨恨情绪，是因为她感受到丈夫的态度冷淡，迫于无奈，她尝试指责他的漠不关心，试图通过吵架让丈夫意识到自己内心的不满。这种行为可能是她在家庭中寻求关注和认可的方式。

在众多马华女作家的作品中，甚少能看到她们将母亲这一角色赋予“伟大”的称号。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认为，母亲既是起源，也是隐喻。女儿和母亲的关系实际上代表了女性自身与其他女性的关系的基础和延伸。¹⁶女儿与母亲决裂的原因可能源自于对母亲性道德上的认知差异，以及对母亲应有形象的期待不符。红莲和令冰对母亲抱有不同的反感，她们期望母亲是一个温柔体贴、遵守象征秩序、为之忠贞的典范，母亲可以说是她们内心焦虑的根源。由此，令冰和红莲对于母亲的憎恨，往往不是真实的憎恨，只是一种迷惘，因为她们无法正视自己与母亲之间的差异。而她们之所以对父亲较为偏袒，是因为父亲是一个经常不在家的人物，所以她们不得不想象出父亲的形象，甚至把他的形象理想化，再加上其对母亲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父亲成了吸引人的对象。¹⁷

第二节 边缘化的父亲形象

¹⁶ Adrienne Rich,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6), 253.

¹⁷ Dorothy Burlingham, "The Pre-Oedipal Infant-Father Relationship," *Psychoanalytic Studies of Children*, no 28 (February 1973):23-47, <https://psycnet.apa.org/doi/10.1080/00797308.1973.11822287>.

此节以《春秋流转》中令冰的父亲作为研究焦点，探讨其在文本中的思想和行为。李忆著的作品专注于两性和谐，所叙述的对象男女各分一半。但不难看出，不论是女性之间所产生的矛盾抑或是母女关系的爱恨情仇，其实很大可能与男性、父亲有着密切的关系。“父亲”这一词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中的男性“家长”，更是一个伦理身份和概念，如果我们减弱父亲作为男性“家长”的特定身份，那么父亲这个词也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指代女性生命中扮演主导角色的其他男性。作者在《春秋流转》所描述的男性是挫败无能的，是理想男性的缺失，是不称职的父亲。尽管如此，李忆著依然给他们带来一些同情的成分。

弗洛伊德认为，父亲在女儿的性别角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既是指导者、支持者和性别认同的肯定者。他认为，在女儿的心理发展中，大约在三岁左右，她们便开始从母亲的紧密关系中分离，将更多的情感投放到父亲的关系中。这个阶段标志着女孩意识上更清晰地寻求与父亲的联系，打破与母亲的紧密关系。¹⁸在《春秋流转》中，我们可以看出，令冰由于母亲不可理喻的态度而感到厌恶，希望能与父亲的关系更加亲近，从而对父亲有所偏袒，然而这种偏袒是建立在她未察觉到父亲出轨的情况下展现出来的。父亲的出轨引发了几个女性之间关系的变化，是红莲、令冰和桂娘之间矛盾产生的根源。

李忆著的笔下，虽未明言她的女性主义立场，但女性身份成为她笔下难以忽视的符号，让她从这个角度去审视两性的关系。在《春秋流转》中，李忆著所勾勒的女性角色往往具有坚强的内心和强大品格，相较于积极正面的女性形象，她描绘的男性角

¹⁸ Jane Milton 等著、施琪嘉等译，《精神分析导论》（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页 70-71。

色多呈现出懦弱、负面的一面，尤其是对父亲形象的刻画，被描绘得颓废失意。李忆菘笔下的父亲形象在《春秋流转》中所呈现的挫败和无能，主要表现在他的事业和家庭地位上。颜世昌在镇上唯一的药材铺“广生堂”的后面的小房间替人把脉看病，十年如一日，却从未获得客观的报酬。尽管孙桂娘多次劝说他自立门户，他却始终坚守着不忘恩负义的态度，宁愿接受微薄的薪水，也不愿意改变现状。频繁的夜谈使得他与孙桂娘的关系越发僵硬，他觉得孙桂娘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难以理解他的处境。

在这种紧张的家庭氛围中，他不仅未能履行丈夫的责任，也鲜少与自己孩子交流，导致父女之间保持着一种疏离感。颜世昌不仅彰显了挫败和无能，也展现出更多的不负责任，出于不愿被贴上忘恩负义者的标签，他选择了沉默和不抗拒。尽管感受到家庭关系的极度僵硬，却选择视而不见，从未考虑修复破裂的家庭纽带，反而将他与妻女应有的情感和关怀放在了红莲身上，他对红莲的态度温柔慈祥，甚至表露出与平时罕见的幽默和开朗。即便红莲与他有着年龄上的差异，同时也是其妻子和女儿重视的人，他仍然不顾世俗的眼光，选择与红莲同行，而对妻女的感受置之不顾。

颜世昌的形象反映了一种典型的男性缺失形象，这种缺失指的是其形象中缺乏对于家庭的关怀和缺乏传统男性应有的责任感，映射出社会对于男性期望的某种失望和焦虑，因为他未能履行家庭中的角色，无法承担起家庭的重要责任。弗洛伊德强调父权对家庭内部和成员心理构建的影响。¹⁹父亲扮演着权威和支持者的角色，他的存在能够为家庭成员提供安全感和支持。然而，当父亲的形象变得无能、不负责任时，家庭的稳定和支持就受到威胁。颜世昌的无能和对于红莲的偏爱不仅加剧了家庭关系的紧

¹⁹ 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页 25-26。

张，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妻子的心理状态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不负责任使到家庭失去了必要的平衡和支持，让家庭的女性成员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家庭的缺陷和不足，这种父亲形象的塑造可能是女性角色内心坚韧和坚强品格的源泉。

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在华人文化中具有不可言喻的重要作用，而父辈的形象也相应着具有为人榜样的作用，因而他们在文本中大多体现为勤劳、本分、为子女家庭甘愿牺牲一切的特征。当然，在马华作家的文本中，父辈形象至高无上，被刻画着正面的歌颂与礼赞，同时也有被贬义的父辈形象，《春秋流转》中颜世昌并不是个称职的父亲，他对妻女的关心甚少，也极少将重心放在家庭上，在家庭和红莲之间，他更是多次选择了后者。父亲弃家不顾和对孩子的不闻不问，凸显了母亲歇尽全力为家庭的操持，家庭的权力过渡到女性手中，父亲在家庭的地位被解构，由传统意义上的庇护者沦为失败者。

李氏在《春秋流转》中提到“男人是女人的灾难根源”，颜世昌缺乏勇气去承担对妻子和女儿的责任，母女俩在无奈之下选择了离家出走，同时他也无法割舍对红莲的恋慕，红莲忍受不了侮辱跳河自尽，他认为有愧于红莲，却丝毫未对自己的妻女感到愧疚。这种态度自然成为导致家庭破裂的根源，同时也是女性发生悲剧命运的根源。李忆若为父辈的刻画进一步暴露了父辈人物的罪恶，从而颠覆了父辈一贯的光辉形象。

第三节 小结

《春秋流转》深入探讨了家庭关系、母女互动以及父亲形象的复杂性。母亲和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情感表达方式对母女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母亲和父亲的角色扮演往往在塑造女儿对家庭和母亲的看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母亲是情感支持和教养的主要人物，她的态度和行为对女儿产生直接的情感影响。母亲的教导方式、对待女儿的态度，以及对家庭和情感的投入，会在女儿心中塑造一种对家庭和情感的认知模式。另一方面，父亲在女儿成长过程中的态度、参与程度和情感投入，同样对母女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父母的情感互动和家庭地位影响着女儿如何看待和理解家庭关系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

在小说中，母女关系显现出多重情感，呈现了女性在家庭中的挣扎。红莲和令冰对母亲的态度既有爱也有怨，试图超越传统对母性的期待和定位。父亲形象的描绘则颠覆了传统，颜世昌的懦弱和对家庭责任的漠视导致了家庭的紧张和破裂。这种深刻的论述揭示了《春秋流转》里家庭关系及性别角色的复杂性，主要强调女性在传统压力下的挣扎，以及对母性和父性形象的重新审视。小说通过角色形象的多样性，向我们展示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同家庭动态和个体挣扎。

第三章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从人的主体意识的角度来看，女性自我命名的历程实际上是一个女性不断认知自我、女性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以及女性主体性不断建构的过程。²⁰女性主体性，既是女性因其特质而成为女性的特性，代表着女性对自身作为生命存在的自觉认识。这种意识使得女性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份，思考自己的生存处境，并追求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激励了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促使女性追求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价值观念。²¹这种女性意识成为女性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时也是支撑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的基础和核心观念。

在文学作品中，有的女作家透过描述已婚或离婚的女性，强调了女性鲜明的自我意识，以及她们追求独立自主的精神。这类女性在李忆菘的作品中尤多。这些女性形象在文本中展现出对自我认知的不断探索和塑造，强调对自身地位和选择的关注，以及在社会中对自主权利的追求。女性主义理论关注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权力和自我认知，强调女性的自主性和追求平等的意识。通过对文本中女性角色的解读，本章节将运用女性主义理论，探讨文本中的女性自我意识，以及女性和谐的探寻。

²⁰ 李有亮，〈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多重身份及修辞策略〉，《天府新论》，2016年第5期，页140。

²¹ 晏丽，〈论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女性主体意识〉，《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页55。

第一节 宿命下的反抗意识

此节以《春秋流转》中的令冰及孙桂娘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她们在生活中表现的反抗意识，深入理解她们对传统性别角色和社会压迫的回应，以及她们对自我认知和自主权利的不懈追求。女性这个概念的内涵长期以来受制于几千年的父权制历史文化。女性从开始觉醒的那一刻起，就不断地与无比强大的男权传统对抗，争取属于自我命名的权力。西蒙德·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认为，在父权制度下，语言本身对女性造成了压迫，使女性长期处于沉默状态。女性仿佛被禁言，不论她们经历多么丰富，却难以表达出来。²²因此，女性自我认知、自我命名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被视为解放自身的基本内涵。

“父亲等同于社会，母亲等同于家庭”的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内化，悄然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因此，历史似乎也被视为男性世界的历史，男性的经验代表人的经验也涵盖了女性的经验。²³李忆著希望女性能够拥有自我意识，找到自己的话语空间和表达方式。她塑造的令冰、桂娘等人物，虽受困于父权社会的桎梏中，却不愿将她们局限于“传统”女性的标签中。她塑造了这些女性角色，试图让她们转变成具有反抗意识的新思想女性，鼓励她们摆脱以家庭为中心、为丈夫和孩子服务、无法拥有工作权力的传统女性的束缚。在小说中，令冰和桂娘试图超越传统的社会规范和期望，寻求自我认知和自主权利。令冰通过行动、言语或内心的挣扎来反抗这种束缚，表现

²²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作者序》（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页 1-18。

²³ 肖薇著，《异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成都：巴蜀书社，2005），页 71。

出对传统角色和期望的拒绝，而桂娘则在她的行动和选择中，试图突破社会赋予的限制。

桂娘作为旧式妇女，长久以来将自己捆绑在自己同男性组建的家庭中，被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定义束缚着，也是造成婚姻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这种女性意识在经历多次悲剧后逐渐得以呈现，在漫长而无望的争吵和冷战之后，她开始察觉到丈夫的态度越来越冷淡，甚至怀疑丈夫可能在外有了其他人。为了安抚内心的不安，她前往观音庙求得三世书的指引，三世书给了她一份安心，然而当她请求丈夫顾及家庭完整时，依然无法挽回丈夫的心。而令雪突如其来的逝世，更是让这个已经有了裂痕的家庭雪上加霜。丈夫的冷莫和服错药物，导致令雪无法及时被救治，丈夫的沉默更是加强她内心怨愤的情绪。经过丈夫的冷落、令雪的去逝，她的自我意识才开始觉醒，“为母则刚”为衡量女性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意味着女性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孙桂娘最终选择去当食堂帮手，也不愿再次忍受感受上的屈辱。当她决定离家出走时，她给了令冰自己选择留下或离开的权力，甚至做好了失去女儿的心理准备，也不曾想过以女儿作为妥协的借口。

当令冰需要选择就业方向时，孙桂娘希望她能当老师，因为除了上课之余，还能有半天的时间照料家庭，她灌输令冰必须以家庭为重的观念，或许是因为她的婚姻受挫的关系，所以其认为工作固然重要，但一个幸福的婚姻必然大于事业。孙桂娘依然具有传统女性“宜室宜家”的标准，但也保留部分新女性的自觉性，她鼓励令冰要有一份稳定的事业，既能拥有事业又能兼顾家庭，而不是鼓励令冰活在男性话语权下的妇女，避免成为母亲悲剧命运的延续者。

令冰是文中展现现代意识的女性角色，尽管母亲的婚姻悲剧给她带来巨大的阴影，她还是勇于组织一个圆满的家庭，但这段婚姻仅仅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长，当她逐渐地发现丈夫在外面有了另一个家庭，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婚。她果断地做出了与母亲不同的选择，这种果断可以理解为她拒绝成为母亲的再现，又或者是忍受感情上的耻辱。作为具备现代意识的新女性，她能够依靠小学老师的工资来养育孩子，也能够理解母亲所经历的困境，不再怨恨前夫的出轨，父亲和赵红莲的背叛，她学会宽恕前夫、父亲和好友红莲。作为一个破碎家庭的个体，令冰展现了行为和思想上都成熟，有能力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的现代女性。

在小说中，李氏以独特的视野，通过对女性人物在狭小的生活空间内的心理变化和语言描述，揭示了她们在男权统治下并未被彻底压制的命运。这些女性角色面对来自社会、家庭和文化的限制，依然没有失去自我。尽管她们所采取的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她们仍然选择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在各种境遇下的感受。这种重新构建的女性意识必然意味着彻底打破旧有的认识框架，重新审视，重新塑造自我。

第二节 女性关系的探寻

此节以《春秋流转》中的红莲、令冰以及孙桂娘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她们从相互矛盾到互相和解的过程。作为个体，我们意识到“女性之间缺乏真正的友谊”是根植于父权文化下人们所给予的一种刻板印象。然而，社会赋予女性的束缚，则需要女性共同解绑。因此，在这个建立友谊的过程中，女性才能真正体会到被倾听、被看到、

被理解的感受。在《春秋流转》的全文描述中，我们看见爱恨纠葛下的女性和谐。李忆菀在小说中，向我们描述红莲、令冰和孙桂娘等人物之间复杂的女性关系。虽然矛盾产生时，红莲、令冰和桂娘之间体现的仍然是女性关系的阴暗面——憎恨，但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她们之间逐渐地互相理解、互相和解的过程。

令冰和孙桂娘之间的矛盾是经历了种种悲剧后才得以化解的，从令冰懂事开始便对母亲产生怨恨，直到父亲的出轨和妹妹令雪的去逝，令冰才逐渐从中理解母亲的行为。令冰的母亲一开始对丈夫的出轨充满愤恨和诅咒，再到后来变成温柔的请求，希望丈夫能够顾及家庭的完整。这样的情绪变化让令冰意识到，母亲并非她一开始所想象的那样不可理喻，加之父亲对红莲念念不忘，完全忽视了母亲的感受，使令冰将对母亲的怨恨转移到了父亲身上。令雪的不幸去逝，母亲在封闭自己之后，开始振作起来。令冰是打从心里佩服母亲的，尽管遇到这么多的事情，她依然可以冷静地面对和处理。

在本文看来，虽然孙桂娘一开始并不是温柔体贴的母亲形象，但在面对红莲破坏自己家庭时，她对红莲依然保持友好的态度，其次为了家庭的和谐圆满，以及对孩子的负责，她愿意忍辱负重，与不爱自己的人和解。在这种处理方式下，桂娘已明显地展现了一个称职母亲的形象，她以孩子为中心，所以才会选择原谅伤害自己的人。使作为女儿身份的令冰逐渐意识到母亲的不容易，更加理解母亲，最终实现母女间的和解。

由于令冰内心依然怀有俄狄浦斯情结，因此她很快将母亲的伟大形象进行还原，并向母亲郑重承诺：“我一定不会让人欺负你的！”²⁴ 令冰与母亲恢复原初的亲近和一体交融的精神境界。从一开始的怨恨，到后来的内疚补偿，令冰认为自己之前只偏袒父亲，一直以来都愧疚于母亲，即使在后来的十多年时间里，依然觉得补偿不了对母亲的伤害。在母女相依为命的时间里，令冰认为母亲一直都是她的知己，所有埋藏在心底的事情都会被看穿。本文认为母亲和女儿之间本就难以产生怨恨，令冰和母亲脱离了异性与婚姻关系的辖制后，女性之间的相处交流的融合与契合使她们意识到女性和男性的心理是完全不同的，可能他们之间永远不能互相理解。在这段和解中，令冰和孙桂娘就存在着一种“共在”的关系，因为第三者的出现、父亲的不负责任和令雪的病死，以致令冰对母亲产生同情和爱。

令冰回到小镇寻找父亲时，父亲已经年迈许多，发现父亲仍然保留着母亲遗留下来的首饰时，表现出他对母亲的愧疚之情，这让令冰认为父亲对母亲仍有情感，对父亲不再充满怨恨。在此之前，令冰更加怨恨红莲，甚于父亲破坏了原本就不幸福的家庭。令冰与红莲曾情同姐妹，但红莲却插足了他们的家庭，加剧了他们家庭的破裂。而化解她们之间怨恨的关键在于红莲已经建立了新的家庭。传言中颜世昌的“姘头”，在令冰和母亲离开后，依然留在小镇生活，甚至在丑闻之后，以正规婚姻的形式嫁给自己的追求者慕都。多年以后，红莲早已脱离了第三者的身份，减少了第三者的威胁，令冰也开始与红莲和解，不再对她怀有怨恨。尽管过去的事情历历在目，但乡里似乎

²⁴ 李忆著，李忆著，《春秋流转》，页 165。

已经逐渐地忘记红莲在他们家扮演的角色，当令冰在桥上与红莲巧遇时，她也不再心存芥蒂，选择原谅红莲曾经给他们家庭带来的伤害。

女性与女性之间产生的矛盾，激发了女性之间的同情，以致她们为彼此的共同利益而团结一致。令冰与母亲的和解，以及令冰原谅了红莲，这种女性间的真情，实际上是鼓励女性还原自我意识，摆脱对婚姻与家庭的束缚，团结起来走出父权的塔楼。在这场斗争中，她们为彼此提供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持，打破传统社会所树立的女性之间嫉妒、攀比和猜忌的怪圈，重新定义了被社会妖魔化的女性关系。

第三节 小结

女性的主体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呈现出一种模糊的形态，许多女性还处于未觉醒或是刚觉醒的状态，同时也有更多女性则是处于一种混沌、模糊的状态。当女性主体意识与现实相结合时，便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她们通常会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而这种明确的女性主体意识及独立人格普遍上以观念的形式存在。²⁵李忆著十分重视女性的主体意识，其对这些命题的叙写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她在作品中展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日渐觉醒，并为这些女性塑造了具有主动性的人生抉择。

《春秋流转》展示了女性由矛盾走向和谐的演变过程，以及她们勇于摆脱宿命束缚的自觉。女性之间所体现的反抗意识和情感联系，不仅是关于孙桂娘和令冰所经历

²⁵ 郭艳，〈时代文本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表达——略谈艾伟小说的女性形象〉，《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1期，页47。

的个人挣扎，更是关乎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互相支持和达成和谐的意义。对孙桂娘而言，她长久以来被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定义束缚着，但在经历了婚姻悲剧后，她的主体意识也逐渐开始觉醒，她不再忍受作为一个妻子的屈辱，而是选择了离家出走。而令冰目睹了母亲的经历后，也争取自主选择 and 塑造自己命运的权力。令冰、红莲和桂娘之间的矛盾，到最终的互相理解和和解，展现了女性间情感的复杂性和可塑性。她们之间不只是矛盾的交织，更是一个关于成长、接纳和宽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们逐渐超越了传统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和力量。

第四章 母女关系的羁绊

在这个社会中，孩童的日常照料主要是由母亲来承担，对孩童最具意义的关系，自然是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孩童的自我意识也是在这种关系中成长起来的。然而，母女关系往往体现为一种模式或共享一个故事，即排斥或依赖共存的母女关系。波伏娃在《第二性》一书中对母女关系部分的分析有提到：在大多数涉及“母女关系”的情境中，父亲缺席的家庭里，母女关系常常呈现紧张对立的，互不理解的状态，这是排斥；母亲通过照顾、约束女儿来获得自尊和权威，女儿通过顺从和渴望得到母亲的认可和关爱，这是依赖。²⁶李氏在《春秋流转》中勾勒出相互爱恨纠缠的母女关系，即便其中一方表现出抗拒的行为，但在这种关系中依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牵连或情感交织。令冰对母亲的爱恨表现在对父亲的怜悯，母亲日日夜夜的争吵，使她对父亲产生同情，直到父亲的背叛，令冰才逐渐地将关注转移到母亲身上，并从日后相依为命的生活达到共生的关系。红莲因目睹母亲唐丽球的出轨行为，厌恶母亲在门口与其他男人调情的模样，同时也厌恶她对父亲的背叛，直到她做出了类似于母亲的行为，才意识到自己成为了母亲的再现。本章节将探讨《春秋流转》中令冰、红莲和母亲在矛盾化解后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²⁶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页 325。

第一节 共生母女

此节以《春秋流转》中的令冰以及其母亲孙桂娘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二人在化解矛盾后，相依为命间如何产生“共生”的关系。弗洛伊德指出共生是指“两个个体之间相互抑制的依赖关系，尤其是指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寄生关系，更常见的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寄生关系”。²⁷母女之间早期的亲密关系中最显著的特点是长期的共生感和密不可分的亲密感。由于母亲和女儿同是女性，她们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认同感和相似的情感特点。实际上，孙桂娘和令冰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相似点在于她们共同的女性身份和经历。孙桂娘不仅是扮演着令冰的母亲，更是她的前身和未来的投射。在令冰试图摆脱传统女性的束缚之前，她和孙桂娘的命运如出一辙。即使身处于人生不同的阶段，她们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共生关系。

李氏在文本中所关注和思考的女性，不仅是女儿，同时也是母亲的双重身份。她对母女关系的探索涉及女性的婚前和婚后两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完成了从“女儿”到“母亲”的转变，同时具备双重身份。只有在自己重复了母亲的人生经历，才会自然地理解母亲当初所经历的困难。随着令冰在社会角色上开始扮演着与孙桂娘相同的角色后，仿佛继承了母辈的命运，和母亲孙桂娘一样开始扮演起男性的家长角色，突显出母女的社会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构性。在情感生活中，母女二人呈现出潜在的相似性。由于孙桂娘也曾经历芳华年少，承受过许多挫折和失败的婚姻，自然能够理解令冰情感上的顾虑和忧愁。母女之间的情感联系经常根植于共同的

²⁷ 伊基·弗洛伊德著、蔺秀云译，《厄勒克特拉 vs 俄狄浦斯：母女关系的悲剧》（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页 36。

经历和血缘联系。令冰和孙桂娘都经历了生活中的挫折和痛苦，这种共同的经历加深了她们的母女情感纽带。血缘联系使她们之间的情感更加紧密，这种连接不仅是外在的，更是深入到灵魂深处，使她们产生共鸣和理解。当孙桂娘目睹女儿的情感困惑时，尽管自己也历经波折，但她依然给予女儿积极的建议和鼓励女儿追求自由情爱。后来，令冰与陈伦式结婚，并拥有一个孩子，当时母亲感动得双眼通红，这加强了两人之间的母女情感。

当令冰婚姻生活出现变化时，作为女性的孙桂娘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真正根源。“谁开始不是一条心的？以后明里暗里古怪文章就多了，而且——”母亲迟疑了一下，随之换了一种语气说：“你本身也有问题，你要不是真老实就是装糊涂。”²⁸孙桂娘也当即提醒令冰留意自己的婚姻危机的讯号，孙桂娘之所以能迅速地捕捉到问题的所在，表明了这种经历对她来说并不陌生。要完全理解另一个人，通常需要经历过类似的处境，承受相似的痛苦，或是有过类似的觉醒体验，这种理解是非常罕见的。这种悲剧似乎从孙桂娘身上延续到了令冰身上，孙桂娘在婚姻中遭受了另一半的背叛，而令冰同样也是遭到陈伦式的隐瞒和背叛，但令冰与母亲不一样，其果断地选择离婚，这让孙桂娘很是欣慰。加之，孙桂娘将自我投射到令冰的身上，间接通过令冰的成长使自我逐渐完成，令冰的遭遇和心境是孙桂娘所熟悉和能够理解的。在令冰与陈伦式离婚后，孙桂娘也一直替她照看孩子，从未考虑过放弃她，这显示了母女之间情感上的共通性和相似性。

²⁸ 李忆著，李忆著，《春秋流转》，页 198。

母女之间最深厚的联结往往源自天然的亲情，是肉体上的血脉相连、灵魂上的互相滋养。血缘关系增强她们之间的依存性和共生感，使她们更愿意倾听对方、理解对方的处境，并提供情感上的支持。虽然令冰长久以来对过去家庭破裂的伤痛和对父亲的愤恨难以释怀，但她从来都是闭口不提，以免触及母亲的伤痛。孙桂娘清楚地感受到令冰的痛苦和情感。波伏娃曾言：“母爱不是直觉的、天生的，母亲对小孩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母亲的处境。”²⁹ ‘母亲先是笑笑，眼眈眈地注视着我，少顷，幽静地说：“你心里的事我怎会看不出来，你是他女儿。其实，当我看着你处理元生的事时，就已经明白了大半……”。’³⁰ 尽管孙桂娘自己经历了丈夫的冷落和抛弃，但对于女儿的选择权，她始终保持尊重的态度。她不仅没有阻止女儿提及父亲，在令冰还未开口就允许她回到小镇探望自己的父亲，突显出母女之间的理解与认同感。这种母女之间的内在联系展现了母亲对女儿的重要性，不仅是血缘的至亲，更是同性之间的精神依托和归属所在。

第二节 母亲再现

此节将以《春秋流转》中的红莲和她的母亲唐丽球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唐丽球的出轨现象如何在红莲身上再次体现，以及这种出轨或成为第三者的身份和现象所产生的根源。

²⁹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页 593。

³⁰ 李忆著，李忆著，《春秋流转》，页 204。

“她不仅背叛了丈夫，也背叛了家庭。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与人私通，不管她有多大的理由，怎么说也是罪不可恕的。作为她的女儿，我亦很难说服自己不怨恨她——她何止是羞辱了父亲，她也使我蒙羞，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做人！”

31

赵红莲于李忆著的塑造下对母亲有着一定程度的憎恨，但对于母女矛盾的描写相对温和，这种怨恨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异性的妒恨、母女之间的淡漠和疏离。根据小镇上的流言蜚语，唐丽球是因出轨而自杀，成为整个小镇多年来难以消停的话题。而“唐丽球”三个字也可以说是红莲的噩梦，以至于她抗拒别人提起母亲的名字。“我的体内流着我母亲的血，就因这一条血脉，把她的悲剧延续到我的身上来。像一场大灾难，横亘于我的生命里。”³² 家庭创伤具有延续性，前辈所遭受的经历往往会在下一代身上有所体现。不难发现，唐丽球和赵红莲母女之间就存在这种延续性。弗洛伊德认为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会模仿和复制父母的行为和特征，尤其是家庭中所形成的模式和

³¹ 李忆著著，《春秋流转》，页 62。

³² 李忆著著，《春秋流转》，页 65。

亲子关系。³³显然地，唐丽球的这些经历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她的女儿红莲，对女儿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家庭复制”³⁴。

唐丽球样貌较好，当时身穿洋式婚纱，是小镇上第一个乘汽车嫁过来的人，然而多年后却成为了小镇人民口中的“淫妇”。唐丽球经常站在家里门口等待情夫的经过，这些举动被女儿红莲看在眼里。直到她以上吊的方式结束生命，外界对她的评价仍然未能消退。红莲一直保持对母亲的传言置之不理，但仍然无法摆脱人们对母亲的评价。“每次，当我看见母亲笑嘻嘻地站在门口，我就感到心里很不舒服。”³⁵她内心深处厌恶母亲那种眉眼含春在门口眺望的模样，也决心不成为母亲那样的人。幼时经历的一些事件往往会对人内心造成创伤，而这种创伤会深深地根植在年幼孩子的内心深处，影响其人格塑造。这种影响在红莲身上有所体现。文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臭瓮出臭草”，也暗示了红莲似乎无法完全摆脱母亲的悲剧。

红莲最终成为颜世昌的情妇是在多次自我控制后，最终选择跟随自己内心的决定。她无法抗拒颜世昌的温柔态度，在多次相处交谈后，红莲对他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好感，尽管这违背了伦理道德。当红莲开始接受颜世昌的好意时，表明她逐渐步入了母亲的后尘，成为母亲的再现。她并不是出轨，而是成为了比母亲更让人厌恶的第三者身份。

³³ [奥]弗洛伊德著、戴光年译，《自我本我与集体心理学》（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页 353-359。

³⁴ “家庭复制”通常指的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将家庭中的模式、价值观、行为方式等复制到自己的生活中。这种现象表明，个体往往会在家庭中学习和吸收各种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复制这些模式。这可能包括对亲密关系、性别角色、家庭责任、冲突处理方式等方面的复制。

³⁵ 李忆著，《春秋流转》，页 68。

当小镇开始传播他们的绯闻时，孙桂娘对她的劝说使她感到自责，最终选择跳河自尽。尽管自杀未遂，但她与母亲一样，内心受到谴责，才会选择自我了断。

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本文认为红莲在社会压力和家庭背景下仍然做出插足别人家庭的选择，或许是因为母亲被发现出轨后做出的悲壮选择，给了她难以愈合的精神性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理论关注创伤事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唐丽球的出轨、自杀等事件可能对红莲产生了心理创伤，这种创伤可能会在红莲之后的情感、行为和决策中产生持续的影响。加之与家人的长时间“零沟通”，导致她与家人之间的情感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当孙桂娘视她如同自己的女儿般体贴时，她渴望孙桂娘能成为她的母亲，她渴望得到母亲的爱抚和情感滋养。这种想法和情感主要体现在红莲的父亲在妻子去世后对她的态度从温柔变得恶劣，尽管他们居住一起，但父亲却不待见她，父亲逐渐成为了家里“在场的缺席者”。当感受到颜世昌的关心时，她更是渴望从他身上获得如父亲般的爱情，逐渐忘却了颜家对她的照顾和关怀。

红莲在生活情感上的行为表现有时与母亲相似，这种“母亲影子”的再现可能受到家庭环境和情感遗传的影响。她在无所依傍的现实世界中挣扎许久后，她认定自己跟母亲一样贱，最终还是与母亲的再现达成了妥协。当女性不断地受挫，从童年开始就被迫压抑自己的天性以符合社会的期望，这种压抑阻碍她放松自如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而只能通过破坏、伤害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温暖和爱的渴望。然而这种女性表达往往更难为他人所理解，从而给自己带来更深层次伤害。

第三节 小结

血缘联系作为不可分割的纽带，亦是情感上的依存，这对母女关系起到了双重的作用。首先，它加深了母女之间的情感依赖，使得彼此之间更能理解和共鸣对方的处境。这种情感依赖体现在母亲对女儿的关心、理解和在困境中的支持；其次，它也带来了家庭复杂的现象，即是母亲的经历在后代身上得到再现，这种再现既可能是正面的影响，也可能是负面的，如母亲的不良行为在女儿身上产生影响。

通过对两母女的探讨，文本中也展现了母女之间独立个体的努力，尽管受到血缘联系的影响，但令冰和红莲都在不同程度上试图摆脱先辈的命运，努力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再来也可以看到母女之间的共生关系在《春秋流转》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这种共生关系既体现了母女之间的深刻情感依赖，又表现出家庭复制的现象，使得母女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而丰富。同时也表明，即使母女之间有着难以轻易冲破的隔膜，但骨肉相连的血缘亲情仍是缓解母女矛盾的原始动力。

结语

综合以上所述，本文通过研究李忆著的长篇小说《春秋流转》，深入探讨了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及她们所面临的问题。同时，探究男女在两性婚姻中的关系，反思女性对婚姻生活中之态度，并探讨了作品中展现的女性之间的矛盾根源、和解的过程，以及母女关系中的羁绊。

通过深入阅读和分析李忆著的《春秋流转》，本文发现这部作品在叙事结构上巧妙地融合了戏剧化元素。故事中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情感纠葛，常常让人感到剧情的发展跌宕起伏。以红莲为例，尽管她从小缺乏父母的关爱，但幸运的是，她得到了令冰家族的照顾。然而，从她的反应来看，似乎并不懂得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恩情，反而多次对身边关爱自己的人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比如执意与孙桂娘的丈夫一起，这种行为不仅令人不解，也显得颇为自私。再者，红莲与颜世昌的关系也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话题。颜世昌见证了红莲的成长，而红莲与令冰的年龄相仿，自然被视为父女。但是，作者选择将两人往更为深层的关系进行探讨。这种年龄差异不仅是两代人间的坎，不同的代际关系也会引发更多关于身份、责任的问题。此外，小说中的某些情节被作者描绘得理想化，尤其是孙桂娘对颜世昌的背叛给予了宽容与理解，这一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常不被人们所接受，因为它往往与社会伦理和道德标准相悖。因此，当孙桂娘选择原谅时，她的行为更像是一种理想化的展现，而非普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常态。

这就反映了李忆著所追求的男女之间的和谐。她的作品展现了男女形象、思维模式以及两性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这些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她不仅探索两性的命运，对两性的心灵和精神状态进行了全面生动的表达，更是深入探讨了女性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反思她们对婚姻生活的态度。《春秋流转》可以被视作一部女性成长史，见证着女性从女儿到母亲身份的转变。女儿性、妻性和母性应属于三位一体，不可缺少的基础。不论是担任母亲抑或是女儿的角色，女性在婚后的表现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她们逐渐将全部关注投放在家庭和子女身上，也就是女儿性对母性的妥协，开始封闭自己，从而塑造自己的边缘身份。

女性在社会中有着多重的角色与身份。血缘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就存在着代际结构³⁶，不论是哪一种角色，都呈现了女儿性向母性的过渡与转换，同时也存在母性向女儿性的回望。简而言之，女性代际之间存在着承接与转换的关系。与之相关的男性家庭角色结构在女性文本中经常受到排斥，这种“父亲的颓败”如影子一样存在，从不同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写母女的关系和命运。而要在父权社会中实现两性平等非常艰难，建构新的性别秩序就必须解构旧的性别秩序，这时女性间的关系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女性意识到父权社会对她们造成伤害时，她们之间的互相理解、支持变得至关重要，才会实现女性解放。

《春秋流转》正是呈现了这样一个女性世界，两代女性（孙桂娘与颜令冰、唐丽球与赵红莲）的命运中存在着“母”与“女”的承接与转换，呈现出一种无法规避的宿命性。涉世未深的女儿们在成熟程度上尚未完全达到，她们很大程度上仍旧受到男

³⁶ 代际结构：描述和研究不同代的人之间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和冲突的理论。

权社会的思想束缚，仍然奉行着男权体制下的那一套“男尊女卑”和“相夫教子”的观念，用“慈母”这一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母亲。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女儿发现母亲的行为与传统观念中的期望有所偏离，执拗于“母性神话”的女儿很可能与母亲产生隔膜，从而引发矛盾。然而，在承接了与母亲相同的宿命后，又会逐渐理解母女关系是一种“镜像一般的母亲的重复”，是结构上相仿，内容上微微变异的紧张性。

李忆著所期望的是女性能够实现与男性一样独立自主，因此她所描绘的母亲不再是被困于在家庭这个狭小的范围当中，而是摆脱男权文化中“贤妻良母”的传统家庭角色。“母亲们”不再是相夫教子、只知道围绕炉台转的传统母亲化身，而是开始逐渐融入社会大潮中，展示出多种多样的社会欲望。其中所描绘的母女矛盾在自我身份转化和平等沟通的方式下得以化解。母女之间从矛盾到和解的探索暗示了有效沟通和彼此陪伴的重要性。

李忆著作品中的女性特征，主要取决于作者自身的性格和思想所决定，其认为作者的人格极为重要，希望自己是具有宽容心的人。正是因为李忆著对自身人格的重视，才会造就其笔下的女性人物也同样具备宽容的性格。因此，她的作品风格基本上与她做人的态度一样，带着鲜明的个人烙印。在众多马华作家的作品中，李忆著的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而独树一帜。与那些充满戏剧性冲突和扣人心弦情节的文学作品相比，李忆著的笔触显得更为细腻、平和。她的故事往往围绕着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展开，这些看似平凡无奇的琐碎小事，在她笔下却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就如邵德怀所说：“既不庸俗，又很好读”，正是李忆著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³⁷

³⁷ 邵德怀，〈别一种风采——试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李忆著的小说〉，页 89。

进一步探究，不难看出，李忆著的作品并非完全是对日常琐事的简单记录。实际上，她在其中也巧妙地揭示了一些具体事件，甚至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如何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人物的一生。就如本文探讨的《春秋流转》所揭示的那样，那些表面看似微不足道的婚姻纠纷，实则隐藏着深刻的人性阴暗面。这种通过普通事件揭示人生哲理的手法，为李忆著的小说增添了一种深远的意义。这个由生活基础形成的亮点，是其不断思考和观察社会生活所得来的成果。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对生活中细节之处的敏锐捕捉。正是因为这样的洞察力，使得李忆著有别于其他作家的创作风格。

参考文献

专书

[奥]弗洛伊德著、戴光年译，《自我本我与集体心理学》，吉林：吉林出版集体有限责任公司，2015。

[奥]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奥]弗洛伊德著、周丽译，《精神分析引论》，武汉：武汉出版社，2014。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Jane Milton 等著、施琪嘉等译，《精神分析导论》，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李忆著，《春秋流转》，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6。

李忆著，《菱花照影》，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15。

肖薇著，《异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成都：巴蜀书社，2005。

王先霏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伊基·弗洛伊德著、蔺秀云译，《厄勒克特拉 vs 俄狄浦斯：母女关系的悲剧》，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张一兵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Irigaray Luce, ed. *Philosophy in the Feminine*: London-Routledge; 1991.

Rich, Adrienne.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New York-W. W. Norton; 1976.

专章

戴小华、叶啸等编，〈李忆著〉，《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页 204-210。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06。

林春美，〈女性触觉——马华小说母女关系与姐妹情谊〉，《马华文学第十四讲》，页 213-230。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

期刊论文

方肯，〈对文学真诚，宛如宗教：李忆著〉，《马华文学》2013 年第 13 期，页 23。

郭艳，〈时代文本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表达——略谈艾伟小说的女性形象〉，《中国文学批评》2023 年第 1 期，页 47-51。

李有亮，〈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多重身份及修辞策略〉，《天府新论》2016 年第 5 期，页 139-144。

李子云，〈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著〉，《评论和研究》1996 年第 1 期，页 50-52。

马峰,〈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页41-48。

邵德怀,〈别一种风采——试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李忆著的小说〉,《小说评论》1992年第4期,页86-89。

晏丽,〈论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女性主体意识〉,《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页55-59。

Dorothy Burlingham, "The Pre-Oedipal Infant-Father Relationship," *Psychoanalytic Studies of Children* 28 (February 1973):23-47, <https://psycnet.apa.org/doi/10.1080/00797308.1973.11822287>.